

清高宗御制诗文创制流程及代笔问题探疑*

——以新见“乾隆御稿”为核心

高 策

内容摘要:清高宗御制诗文体量颇丰,且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不过其创作主体和创作流程存在较大疑问,文臣“代笔”之疑团构成对其研究、利用的阻碍。近年来进入学界视野的“乾隆御稿”,即清高宗诗文手稿及誊抄稿,为探究此问题提供了重要材料。结合相关序跋、清人笔记等,再将实物资料与历史记载相互印证,可厘清清高宗诗文具体的创作流程。进而通过区分御制诗和御制文,对创作主体进行考察,可得出结论:御制诗应当大多为清高宗自己创作,文臣主要负责誊抄、作注等;而御制文中,碑文、序、记等存在文臣代为撰写的情况。上述结论对久已有之的代笔说做出了回应,并为充分研究、合理使用清高宗诗文奠定基础。

关键词:清高宗 御制诗文 代笔 乾隆御稿 创作

清高宗乾隆帝(1711-1799)是中国历史上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之一,其思想、言论和行动深刻地影响着当时社会的各个方面。除了政治方面的成就,他还是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传世诗文集共收录其诗作44038首,还有文章1904篇^①。这些作品系年清晰、记录详实、注释丰富,生动地再现了18世

*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第69批面上资助项目“清高宗御制诗文数据库建设及文献学研究”(2021M691844)阶段性成果。

①关于清高宗御制诗的数量问题,前人众说纷纭。笔者对收录清高宗即位前诗作的《乐善堂全集》进行逐篇统计;对于《御制诗初集》、《二集》至《五集》以及收录他归政后作品的《御制诗余集》,核对诸版本每卷前标注的诗歌数量,若各版本有差异则逐篇计数;最终加总得到此数。学界对清高宗御制文数量关注不足,兹记录对各文集逐篇统计的结果如下:《乐善堂全集》238篇,《御制文初集》583篇,《御制文二集》593篇,《御制文三集》194篇,《御制文余集》36篇,《日知荟说》260篇。

纪中国几乎全部重大的事件,“具有与档案、官书比较毫不逊色的价值”^①。正因如此,厘清其创作、编刊的基本史实成为了学界亟待解决的命题。

帝王的身分加之极其庞大的创作体量,令读者对御制诗文的创作主体产生了疑问。早在清末民初,即有沈德潜为御制诗“代笔”的野史流传。题为小横香室主人所编《清朝野史大观》及天赓编《清代外史》皆载有沈德潜(1673-1769)为乾隆捉刀一事:

尝告归,上以所著诗十二本,令梁诗正委之改订,颇多删润。迨归愚疾歿,上命搜其遗诗读之,则已平时所乞捉刀者咸录焉,心窃恶之。^②

至上世纪40年代时,美国学者房兆楹在所作乾隆帝传记中也存有质疑:“如果这些诗都是他自己写的——几乎可以肯定他写不了——他就是中国历史上最多产的诗人。”^③此后,学界持续关注与之相关的问题:清高宗御制诗文的创作过程中,是否有文臣的参与?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是否存在文臣为创作主体的“代笔”现象?这些问题仿佛“迷雾”一般,构成了学界研究利用这一重要史料的障碍。

颇为幸运的是,近年来逐渐进入大众视野的“乾隆御稿”(即大量乾隆诗文手稿和誊抄稿),为解答上述问题提供了宝贵资料。新出现的实物材料,为破解“迷雾”带来可能,可惜尚未得到足够重视。

有鉴于此,本文拟以新见“乾隆御稿”为核心,考察清高宗御制诗文的创作流程,厘清其中文臣发挥的作用,并对前人所持“代笔”之说进行回应。需要说明的是,清高宗即位前的作品编成《乐善堂全集》,并未涉及文臣参与及代笔之说,以下所谈“御制诗文”仅指高宗即位后的作品。

一、前人研究综述

1985年,戴逸《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首次集中讨论御制诗的“代笔”问题^④。此后,朱赛虹接连发表《清代御制诗文说略》《清代御制

①戴逸:《研究清史不可或缺的珍贵史料——推荐〈清高宗(乾隆)御制诗文全集〉》,《清史研究》1994年第2期,第110页。

②小横香室主人编:《清朝野史大观·上》卷三《清朝史料·沈归愚诗狱》,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2010年,第292页。另见天赓编:《清代外史》第四篇《乾隆朝》第十一章《文字之狱》,《清代野史》第1辑,巴蜀书社,1987年,第129页。

③[美]房兆楹:《弘历》,恒慕义编,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译:《清代名人传略》中册,青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136-137页。

④戴逸:《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5年第5期,第41-48页。

诗文概析》两篇文章,对“御制诗文中的非御制成分”^①作了分析。两位先生的说法也被诸多学者沿用。至2014年,陈圣争《乾隆帝文学与文学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②则对此问题展开了更为全面的论述。兹概述前人说法如下。

(一)文臣参与御制诗文创作的三种模式

前人所论文臣参与御制诗文创作的模式,按文臣发挥作用由小及大,可以概括为如下三种:

第一,高宗口述,文臣记录。陈圣争考述云:“乾隆帝口诵诗章,或全篇,或一二句;当值大学士等人(或专人)归后誊默成草稿,或略加润饰;进呈乾隆帝御览改定。”^③所据为清代昭槁《嘯亭杂录》卷七《于文襄之敏》条“御制诗文,皆无烦定稿本,上朗诵后,公(于敏中)为之起草,而无一字之误”^④。

第二,高宗草拟,文臣润色。朱赛虹提出“现存清代档案中,有经过圈点的皇帝御笔诗文草稿。这说明皇帝作诗一般要先写出草稿,然后由文臣润色,再经皇帝过目修改而成”^⑤,这里提到的草稿应当就是“乾隆御稿”。

第三,高宗命题,文臣撰写。朱、陈二人都提出了这种方式,即“先由皇帝提出内容大意,然后由指定的秉笔大臣代为拟就”^⑥,再进呈乾隆帝御览。

(二)“代笔说”的证据

代笔,即署名者授权他人代为创作的现象,通常发生在书画、诗文等领域,也叫“捉刀”;具体到诗文创作方面,代笔的核心表现是:内容创作的主体与署名者不同。

明晰概念后,再来审视上述三种文臣参与创作的方式。第一种,文臣只是负责记录,未涉及作品内容;第二种,文臣虽对内容有润色加工,但创作主体仍为清高宗,很难算作代笔。唯有第三种,创作主体是文臣,方契合“代笔”之含义。学界目前支撑此说的史料有如下三条。

其一,最主要、最直接的证据,是乾隆帝自己的说法。《乐善堂全集》卷首乾隆二年(1737)御制序云:

①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说略》,《紫禁城》1998年第3期,第45-46页。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概析》,《北京图书馆馆刊》1999年第2期,第89-90页。

②陈圣争:《乾隆帝文学与文学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4年,第47-53页。

③陈圣争:《乾隆帝文学与文学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第51页。

④昭槁撰,何英芳点校:《嘯亭杂录》卷七《于文襄之敏》,中华书局,1980年,第207页。

⑤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说略》,第46页。

⑥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说略》,第46页。

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转贻后世之讥。^①

清高宗自己承认了代笔之事,于是被学者们引作核心论据。

其二,即前述野史记载沈德潜为乾隆捉刀一事。戴逸据此分析说:“对于封建时代的皇帝来说,并没有像现代知识分子那样的著作权观念,朝廷养活一批学士词臣,他们的任务之一就是要给皇帝草写谕旨诏诰以及诗赋文章。在学士词臣们看来,这是莫大的荣耀,皇帝也把别人代写的作品心安理得地视作自己的作品。”^②

其三,乾隆朝文臣赵翼(1727-1814)的记载:

寻常碑记之类,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属余。余悉意结构,既成,文端又斟酌尽善。及进呈,御笔删改,往往有十数语只用一、二语易之,转觉爽劲者,非亲见斧削之迹,不知圣学之真不可及也。^③

此段记录汪由敦(1692-1758,谥文端)为清高宗代写“寻常碑记”一事。戴逸由此推论说:“赵翼说的是代写文章,写诗大概也有类似的情形,特别是逢年过节的应酬例作,不见得是皇帝的手笔。”^④

此外,还有学者根据作诗、行文的数量、频率,以常理推论。如朱赛虹列举清高宗写作的高频事件“一次游香山,五天之内‘得诗凡六十七首’,平均一天十三、四首。笔者曾阅武英殿本清历朝《圣训》与《实录》,发现在乾隆四年十二月初十日这一天,高宗作了六篇序文”,进而分析说这不符合科学角度下人“生理、智力活动和灵感的进发”^⑤曲线。

综览上述研究成果,学界对相关问题有所关注。不过,在研究资料上,虽对“御笔诗文草稿”有所提及,但未能充分利用新见实物资料;在分析思路上,将御制诗与御制文合在一起,没有分开讨论。这就致使对御制诗文创作流程的梳理尚不清晰^⑥,代笔之说的证据也需要详加剖析。

①爱新觉罗·弘历:《乐善堂全集》卷首御制序,影印乾隆二年(1737)武英殿刻本,《清代诗文集汇编》第331册,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第47页。按:本文所引清高宗诗文皆出《清代诗文集汇编》,为省篇幅,后文不再注出版信息与作者。

②戴逸:《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第43页。

③赵翼撰,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一》,中华书局,1982年,第7页。

④戴逸:《我国最多产的一位诗人——乾隆帝》,第43页。

⑤详参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概析》,第89页。

⑥陈圣争依据赵翼《檐曝杂记》的记载,大致梳理了御制诗的“制作程序”,详参《乾隆帝文学与文学思想及文化政策研究》,第53页。

二、“乾隆御稿”简述

乾隆御稿“系指故宫博物院皮藏的乾隆帝手稿和手稿誊写本,因存放这批手稿和誊写本的一对剔红云龙纹箱上有‘乾隆御稿’四字,故依此命名”^①。其于2010年首次进入大众视野^②,之后逐渐被整理、展出,此据现有成果简述如下:

其一,内容构成。以体裁来说,包括少量文稿,此外多数是诗稿。以文字来说,有少量墨笔行书手稿,其他基本上是“一一对应”的朱笔行书手稿和墨笔楷书誊抄稿。为便于行文,若笼统称之,则作手稿、誊抄稿;若分别指称,则为:朱笔诗稿、朱笔文稿、墨笔誊抄诗稿、墨笔誊抄文稿、墨笔行书诗稿和墨笔行书文稿。

其二,载体与存放形态:

其形制多为裁剪成统一规格的长条形单张元书纸,也有少量尺寸异常者。

乾隆御稿在清代曾经过初步整理和归类,每年按时间先后顺序叠放,多数年份为手稿一摞、誊写本一摞。少数年份因其诗作较多,会出现两摞、三摞情况。每摞手稿以黄绫箍束紧,其上以墨笔楷书写明“御制诗(干支)”,如果一年有三摞,则注明“上”“中”“下”,以示顺序。之后再按年份层层码放于剔红云龙纹箱中。^③

其三,时间跨度与总体数量。康熙六十一年(1722)至乾隆三十四年(1769)稿件共28132张,乾隆三十五年至嘉庆三年(1798)稿件27503张,共计55635张。

乾隆御稿整理完成与公开发布,尚需时日。不过故宫博物院相继作了几次展览,一些学术论文也对之有所利用,都为本文提供了宝贵的素材。除此之外,在拍卖会上也见到了乾隆御稿,目前搜辑到的共计4次。相关信息见文末所附表格。

拍卖所见稿件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特点。将朱笔诗稿合起来看,对应《御制诗四集》卷三三82首诗中的81首、卷三四138首诗中的110首,创作时间

①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故宫出版社,2017年,第42页。

②2010年,时任故宫博物院院长郑欣森在访谈中简单提到“现在还发现了一批乾隆诗稿”,详郑欣森:《故宫是一座文化底蕴深厚的宝库》,《故宫答问·郑欣森访谈录》,紫禁城出版社,2014年,第32页。

③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42页。

都是乾隆四十一年(1776),颇为集中。同样的,墨笔誊抄诗稿也都对应《御制诗五集》卷四二。嘉德秋拍的相关报道称:“据该诗稿藏家所述,其曾与故宫工作人员核实,故宫所藏御制诗稿中确有部分散佚,但数量很少,或为晚清民国流出宫外。”^①由乾隆御稿的整理形式推知,或为个别“掇”的手稿流出宫外,辗转散落在各藏家手中。

各展览、论文、拍卖所见乾隆御稿,以朱笔诗稿为主体,凡172张、载诗266首;还有墨笔行书诗稿5张,墨笔誊抄诗稿16张,朱笔文稿17张,墨笔誊抄文稿21张。尽管所见数量有限,但具有较好的代表性:一则诗文兼备,各类型稿件皆有;二则跨度较广,尤其诗歌从《御制诗初集》到《馀集》皆有分布,创作时间亦涵盖雍正末年至嘉庆初年;三则包含《御制诗四集》卷三三、卷三四的大部分内容,即拥有具体卷次的个案代表。因此具备了展开对御制诗文创作问题研究的条件。

三、基于乾隆御稿的御制诗文创作流程考

(一)前提:朱笔手稿当为乾隆亲笔

在展开对创作流程的考证之前,先要确证“乾隆御稿”中的朱笔手稿为乾隆亲笔。

第一,从贮藏来看,手稿保存在剔红云龙纹箱,“箱成对,长方形,上有盖,盖顶二龙戏珠纹间刻有‘乾隆御稿’四字。器身布满云龙纹。下部剔红底座。底部髹黑漆”^②。这些元素都代表着皇帝的身份与威严。

第二,朱笔的使用亦是皇帝身份的象征。不过,是否可能是皇帝授权大臣使用、代为撰写诗歌呢?这种说法不甚合理。若文臣为皇帝捉刀,自是私下构思、反复斟酌,再行写就,也无需再用墨笔誊抄一遍;且书写时应毕恭毕敬,不当潦草、涂抹。然乾隆御稿并非如此,有不少涂抹痕迹,例如后文图2朱笔诗稿《题林逋诗帖卷五叠前韵》即是如此。

第三,从笔迹来看,故宫博物院专研乾隆书法的王亦旻认为这些手稿“与其各时期书法的用笔特点一致,只是书写草率,结字不够讲究,但确是其亲笔所书”^③。这里再将朱笔诗文手稿与朱批奏折稍作比较,结合笔迹学的

^①中国嘉德编:《大观·四海崇誉庆典之夜·古代——中国嘉德2017年秋季拍卖会》拍卖品介绍《清高宗御制朱笔诗稿四十九页·御制朱笔诗稿概况》,中国嘉德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7年,第461号拍品。

^②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64页。

^③王亦旻:《乾隆御制诗文稿与他的艺文世界》,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艺术研究院编:《弘历的世界》上卷《丹稿初成——乾隆御制诗文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年,第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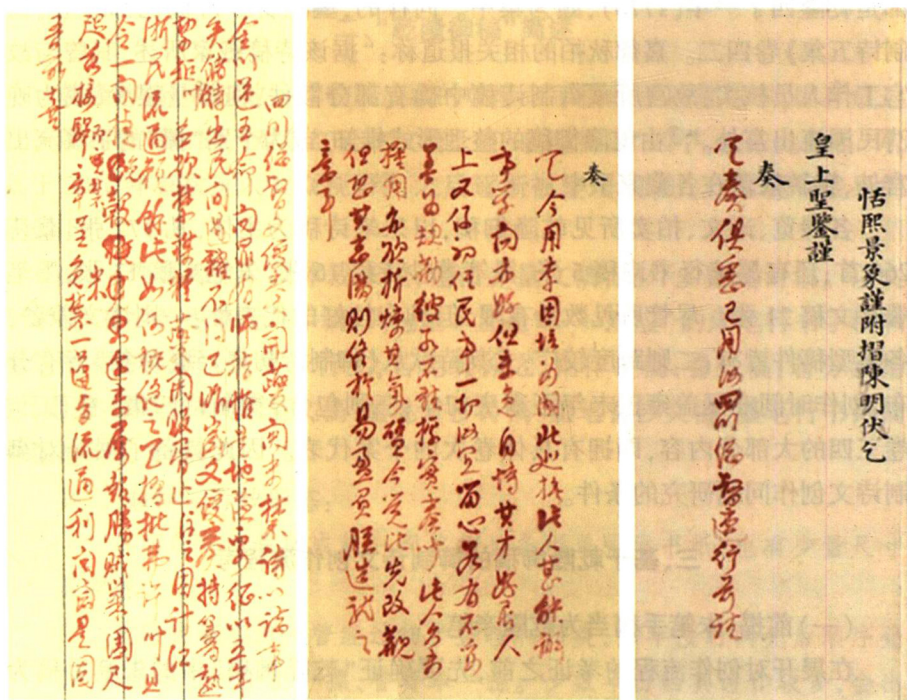


图1 《四川总督文绶奏开夔关米禁诗以志事》(左)、《奏请恩赐御制诗章事》(中)、清高宗朱批于李世杰《奏为敬陈商丘新筑南堤及黄河水势情形事》(右)

相关理论,补充论证。如图1^①所示,虽然手稿的书写更显草率,不过在整体布局、熟练程度、字形特征、倾斜程度等“概貌特征”^②上二者是相近的。进而择取一些“高价值特征字”^③进行比较;“覽”^④字为高宗朱批时最常用的字之

①左边朱笔诗稿《四川总督文绶奏开夔关米禁诗以志事》见北京匡时编:《乾隆御制朱笔诗稿》,北京匡时国际拍卖有限公司,2016年,第40张,该诗收入《御制诗四集》卷三三。中间清高宗朱批,载吴达善:《奏请恩赐御制诗章事》,乾隆三十年闰二月七日,台北故宫博物院藏宫中档奏折(本文所引朱批奏折皆出此,后文注释从略),文献编号403019847。右边清高宗朱批,载李世杰:《奏为敬陈商丘新筑南堤及黄河水势情形事》,乾隆四十八年四月二十日,文献编号403044607。

②卢齐轩:《笔迹学视域下的书法鉴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2021年,第105-119页。贾治辉:《笔迹学》,法律出版社,2010年,第44-46页。

③指“具有独特性、习惯性的字或者偏旁部首”,“特定程度越大,鉴定价值就越高”。详参林霄:《重建祝允明书法标准——基于笔迹学的古代书法鉴定个案研究(上)》,《书法研究》2017年第1期,第57页;贾治辉:《笔迹学》,第76页。

④涉及笔迹比较的特征字,会使用繁体字,以更为清晰地呈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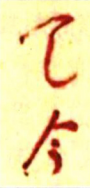
一,写法颇为简化,较有特点;“門”字旁、“糸”字旁,高宗的连笔处理也比较特殊。这些特点在两类稿件中基本一致,列表 1 如下。

第四,有相关记载加以印证。《御制诗四集》卷三三《笔砚匣》一诗,吟咏高宗常用的笔砚匣,其中说到:

二万餘篇总出斯,于斯阙咏太孤伊。白笺朱字有如是,塞北江南无不随……^①

此诗记录了高宗作诗的一些信息。首句注中历数各集诗篇数量,“此云二万,仍举成数而言也”;“白笺朱字”就是关于作诗方式的记载,与所见朱笔白色笺纸诗稿吻合。

表 1 清高宗朱笔诗文手稿与朱批奏折笔迹比较

特征字	清高宗朱笔诗文手稿				清高宗朱批奏折			
覽								
	覽摺 图 1(左)		覽觀 ^②		覽今 图 1(中)	覽奏 图 1(右)	覽奏 ^③	
“門”字旁								
	問罪 图 1(左)	聞捷 图 1(左)	開 图 1(左)	開 图 3(左)	學問 图 1(中)	聞捷 ^④	開 ^⑤	開 ^⑥

①《御制诗四集》卷三三《笔砚匣》,第 325 册,第 331 页。
②朱笔诗稿《冠峰亭》,见中国嘉德编:《大观·四海崇誉庆典之夜·古代——中国嘉德 2017 年秋季拍卖会》,第 461 号拍品,第 36 张,该诗收入《御制诗四集》卷三四。
③清高宗朱批,载李奉翰:《奏闻时届桃汛各属工程水势情形》,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档案编号 403037849。
④清高宗朱批,载蔡新:《奏谢恩赐御书福字荷包并报闽省雨泽事》,乾隆五十三年三月十五日,档案编号 403053504。
⑤清高宗朱批,载吴达善、冯钊:《奏闻衡州府属耒阳县民谢嘉惠等控告柜书多索票钱漕书加米浮收一案事谨将审拟经过呈览》,乾隆三十年十二月七日,档案编号 403022063。
⑥清高宗朱批,载李奉翰:《奏闻时届桃汛各属工程水势情形》,乾隆四十四年二月二十四日,档案编号 403037849。

续表

特征字	清高宗朱笔诗文手稿			清高宗朱批奏折		
“糸”字旁						
	總督 图 1(左)	總聽 图 2(左)	縷 图 2(左)	總督 图 1(右)	終於 图 1(中)	結 ^①

(二)实物与史料的相互印证

明确前提后,将新见乾隆御稿与时人的记载对照,能梳理出御制诗的创作流程。曾任翰林院编修的赵翼详细记载了乾隆帝作诗的流程:

日加已,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皆用朱笔作草,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则诸大臣归遍翻书籍,或数日始得;有终不得者,上亦弗怪也。……余直军机时,见诗片乃汪文端、刘文正所书,其后刘文定继之。由诗片抄入诗本,则内监之职。迨于文襄供奉,并诗本亦手自缮写矣。御制诗每岁成一本,高寸许。^②

这段话所记载的御制诗创作共分为 5 个步骤,皆能与所见乾隆御稿印证,此以乾隆四十九年(1784)所作《题林逋诗帖卷五叠前韵》诗稿为例(见图 2^③)。

第 1 步,“朱笔作草”,对应所见朱笔诗稿,有涂抹、改动痕迹。

第 2 步,“令内监持出,付军机大臣之有文学者,用折纸楷书之,谓之诗片”,对应墨笔誊抄诗稿,实物能见出折纸痕迹;诗歌正文与朱笔诗稿相同。

第 3 步,“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笔令注之者”,由大臣作注。在朱笔诗稿第 4 列“跋册七家”下有“注之”二字,最左有批注“注其人”;于是在墨笔誊抄诗稿中,“三王”注曰“世贞、世懋、鸿绪”,“跋册七家”注曰(见图 2):

谢升孙、陈颀、吴宽、沈周、李东阳、张渊、程敏政。《石渠宝笈》旧藏

①清高宗朱批,载李世杰、徵瑞:《奏为遵旨切实查明两淮提引停歇多年缘由及骆愉所称夹带私销等情弊并将前发骆愉策稿副本一并恭缴事》,乾隆五十一年十月二十日,档案编号 403049298。

②赵翼撰,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二》,第 7-8 页。

③朱笔诗稿、墨笔誊抄诗稿出自华宁:《即景合璧咏双绝:谈乾隆御题林逋书迹二种》,《紫禁城》2019 年第 3 期,第 98-99 页;武英殿刻本书影出自《御制诗五集》卷六,第 327 册,第 300 页。



图2 《题林逋诗帖卷五叠前韵》朱笔诗稿、墨笔誊抄诗稿、武英殿刻本书影

林逋诗卷手书七言近体诗五首，苏轼长歌极为推许，后有王世贞等三跋。又裘曰修得林逋二札装为一册呈进，有谢升孙等诗跋。诸人皆元明以来赏鉴家，非漫为推许者。逋人品高卓，遗墨流传，宜加宝护。况此卷与册璧合珠联，不期而会，尤为艺林嘉话。余自丁丑南巡题句，至今甲辰复携以随畔，凡六叠苏轼韵。中间缕陈颠末以识珍重爱慕，盖不啻三致意云。

诗注将“卷三王跋册七家”这一难解之句的来龙去脉注释清楚。

第4步，由诗片抄入诗本。按赵翼记载，这一步初为“内监之职”，等到于敏中（1714-1780）“供奉”后，此环节则由军机大臣承担。之后，王杰（1725-1805）、董诰（1740-1818）等也为高宗“缮写诗本”^①。御制诗每年成

①“向来朕御制诗章，俱系王杰、董诰缮写诗本”，载《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四九四，嘉庆元年（1796）正月九日丙辰条，《清实录》第27册，中华书局据故宫小红绫本及一史馆大红绫本影印，1985年，第996页。

一诗本,高寸许^①。

第5步,积十二年之诗本,编刊成御制诗集。此诗编入《御制诗五集》卷六,刻本文字与墨笔誊抄诗稿相同。

以上梳理了御制诗创作的大致流程。不过考察更多手稿及誊抄稿,可见更为复杂的实际流程:

其一,除了高宗用“注之”让文臣作注外,还能见到其他作注方式。如乾隆四十一年(1776)所作《恭侍皇太后观灯喜而成什》^②，“习习东风傍晚停”下注“是日有风至晚而静”，“扶携母子百五十”注曰“圣母八旬有五，予六旬有六，合百五十一岁云”，皆为高宗朱笔自注。又如《虚明室》(见图3^③)朱笔诗稿“澄观味宗趣”，“宗”后注“少文”，即南朝画家宗炳。再如乾隆六十年(1795)《除夕》一诗(见图4^④)，朱笔诗稿并无“注之”二字，不过在墨笔中也为“昨成老人说，云十幸能全”作注。

其二，除了“注之”以外，高宗还会给出其他一些指示，要求文臣完成。如核查信息，《虚明室》朱笔诗稿(见图3)有“澄观味宗趣，定性读程(或伊川手查)书”一句，并在“程”字下注“明道”，又于诗旁批“或伊川，手查”。盖命文臣查考，《定性书》究竟是程颢(明道)还是程颐(伊川)所作；确认后，于武英殿刻本中仍注“明道”。又如增补诗序，《命议谥前明靖难殉节诸臣诗以志事》^⑤于诗末指示道“略序数语，期明其事可耳”，于是文臣加入诗序，交代诗歌背景。再如编排题目，《题西湖十景五叠旧作韵·苏堤春晓》^⑥朱笔诗稿前无小题，于诗后说明“‘苏堤春晓’写于前”，是要求大臣编排小题。

其三，有时在墨笔誊抄诗稿上，清高宗会用朱笔进行批改，最终反映在

①考嘉庆朝《大清会典·内阁·汉票签处》有“撰文中书”一职，其职责有“宫殿匾额、楹帖，御制诗文集及赐王、大臣碑文应缮写者，皆恭书焉”，当是在御制诗文成集后，进行缮写誊抄。详参《〔嘉庆朝〕钦定大清会典》卷二《内阁·汉票签处》，《近代中国史料丛刊三编》第64辑，文海出版社，1991年，第631册，第74页。

②图见北京匡时编：《乾隆御制朱笔诗稿》，第67张；该诗收入《御制诗四集》卷三四。

③《虚明室》朱笔诗稿出自北京匡时编：《乾隆御制朱笔诗稿》，第69张；武英殿刻本书影出自《御制诗四集》卷三四，第325册，第346页。

④《除夕》朱笔诗稿、墨笔誊抄诗稿出自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48-49页；武英殿刻本书影出自《御制诗五集》卷一百，第329册，第434页。

⑤图见北京匡时编：《乾隆御制朱笔诗稿》，第43张；该诗收入《御制诗四集》卷三三。

⑥图见浙江省博物馆编：《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文物出版社，2017年，第253页，该诗收入《御制诗五集》卷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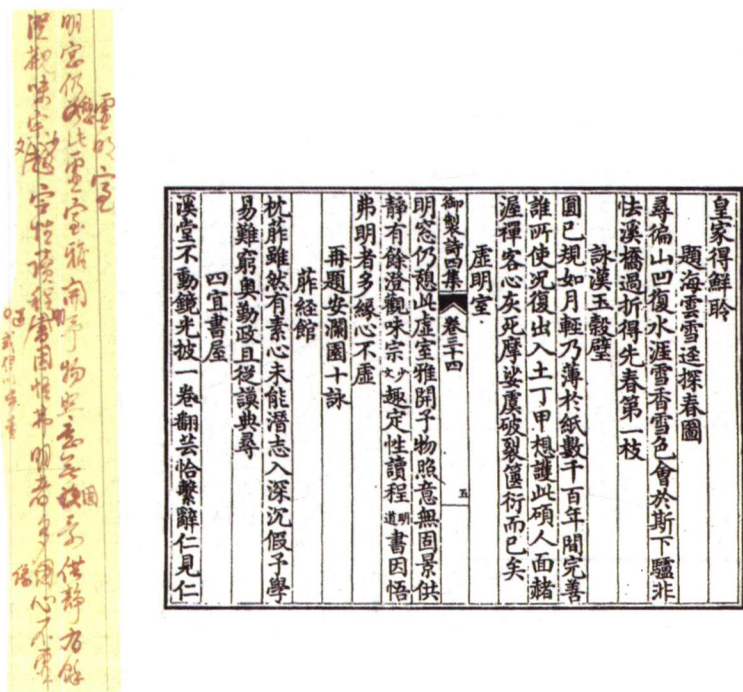


图3 《虚明室》朱笔诗稿、武英殿刻本书影

殿本上。如乾隆五十三年(1788)《回蹕至御园之作》(见图5^①),在墨笔誊抄诗稿上,将“至因秋仲罢猎早,殊较常年猎罢归”中的“因”改为“缘”,“殊较”改为“觉异”;又在“罢猎早”后加入注释“今秋木兰雨大,围场地皆沮洳,故罢猎而归,较常年至御园早数日”说明事情经过。还将末句“刻台报揽游稀”一句的注释加以扩展。原注释为“今夏驻藏大臣庆麟等,忽有巴勒布部落侵犯卫藏西边之报。是以拨兵筹饷,日劳于心,问报不论昼夜。今日回蹕至御园,适接庆麟奏巴勒布闻大兵将至,已释围窜回,即命书旨驰谕机宜,以期永靖遐边”;批注增加内容为:“大兵不可因贼退即回,若贼闻我兵已回而复来,成何事体,必当示以兵威,令其知畏不敢再犯,以期永靖遐边。”对“书旨”详情加以说明,使圣意表达更为完整。

其四,从墨笔誊抄诗稿到最终刻本之间,也会有所改动^②。如上述《除

①《回蹕至御园之作》墨笔誊抄诗稿出自苏富比编:《香港苏富比2019秋拍图录·中国古代书画》,苏富比拍卖行,2019年,第45页;武英殿刻本书影出自《御制诗五集》卷四二,第328册,第205页。

②通过比勘手稿、誊抄稿以及诗文集刻本,可以考见编刻过程的各种修改,拟另撰文述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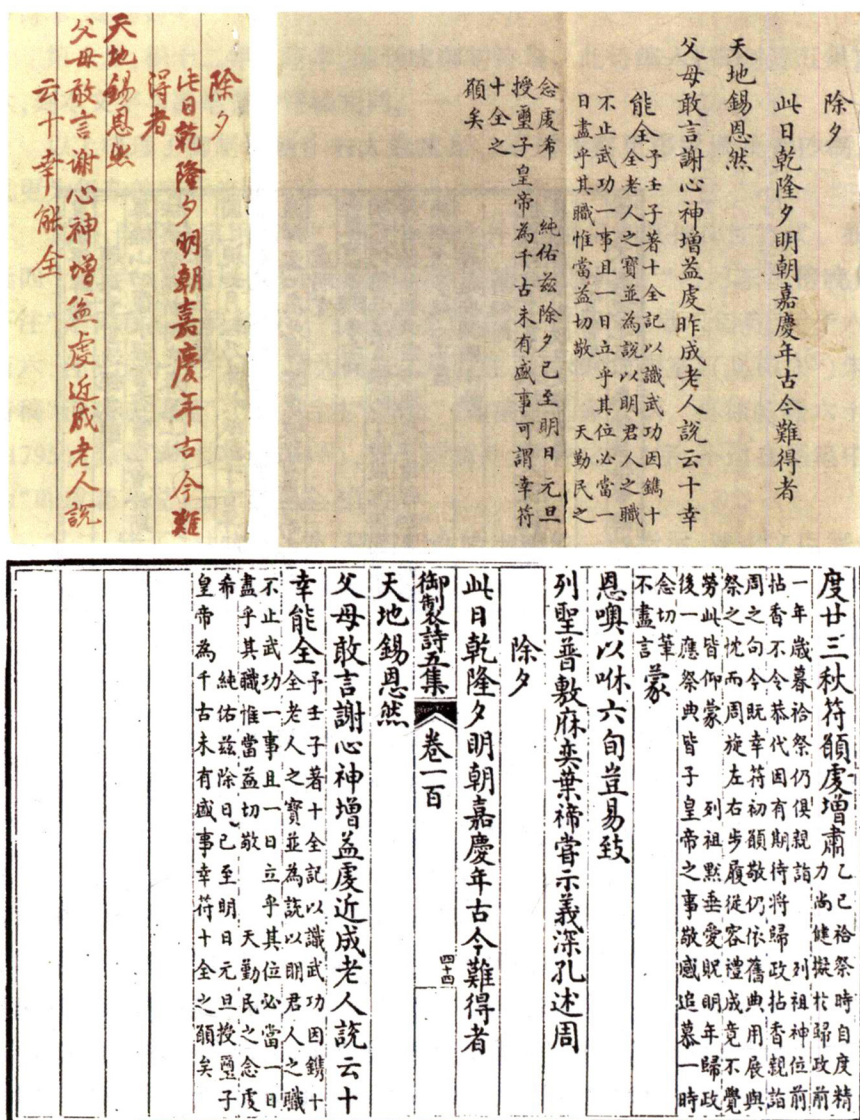


图4 《除夕》朱笔诗稿、墨笔誊抄诗稿、武英殿刻本书影

夕》诗中，殿本把双行小注最后“可谓幸符十全之愿矣”中“可谓”二字删去（见图4）。又《回蹕至御园之作》中，除清高宗御批的改动外，另有诗注“巴勒布”被改为“廓尔喀”（见图5）。此二词皆指今尼泊尔而言，最早定居该地的是尼瓦人，清人称之为巴勒布人。廓尔喀是当地的一个部落，于乾隆三十四年（1769）统一全国，建立新王朝，不过清人仍称之为巴勒布。直至乾隆五十三年（1788），廓尔喀第一次侵藏，也就是此诗创作的时候，驻藏大臣只知巴勒布，不知有廓尔喀，凡奏章皆称巴勒布。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始改称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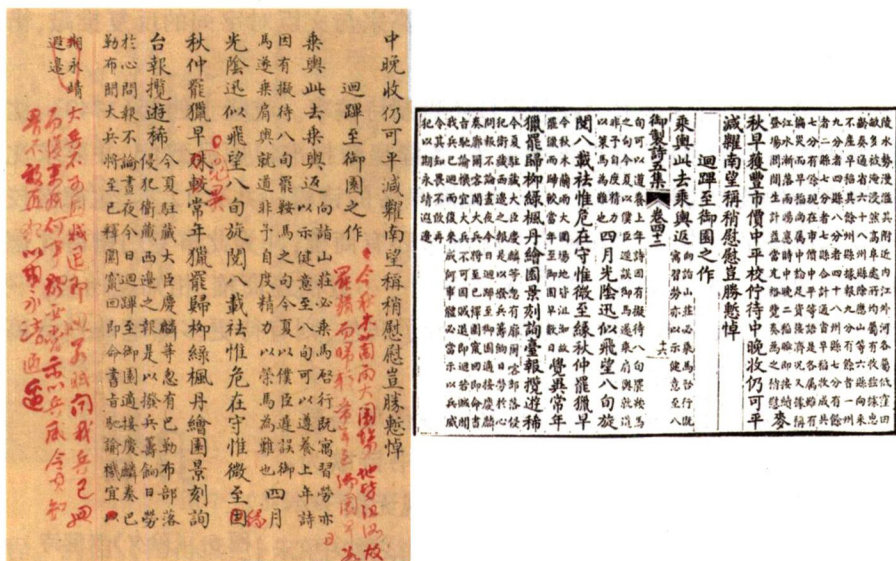


图5 《回辟至御园之作》墨笔誊抄诗稿、武英殿刻本书影

尔喀^①，刻本也因此改动。

(三)清高宗御制诗文的创作流程

借由新见乾隆御稿与史料记载的相互印证，整合、厘清御制诗的创作流程如下：

步骤	主要工序	备注
第1步	清高宗朱笔作草； 或自注，或用“注之”让文臣作注。	可能有其他指示；文臣核查信息、调整题目、补充诗序等。
第2步	文臣用墨笔折纸楷书誊抄、依令作注。	无“注之”时，文臣亦或自行作注；是否对正文进行了润色，尚待考证。
第3步	清高宗用朱笔批改。	此步骤或有或无。
第4步	内监或文臣将诗片抄入诗本。	
第5步	积十二年之诗本，编刻成御制诗集。	编刻时或有改动。

有三个问题需要说明。第一，关于文臣是否润色诗歌正文。目前所见墨笔誊抄诗稿与朱笔诗稿比较后，正文仅发现一处异文。《除夕》朱笔诗稿作“近成老人说”，誊抄稿“近”作“昨”，然而在殿本中又作“近”（见图4）。仔细观察，可以发现誊抄稿“昨”写于粘贴的小纸片，依稀可见纸片下“近”字

①详参徐圣言：《清朝涉外战争史》，江苏大学出版社，2018年，第67-68页。

痕迹(见图6)^①。这可能由于创作过程中高宗与文臣对字词的反复推敲,惜囿于材料之限,无法定论。

考诸史料,有沈德潜为乾隆帝校阅御制诗稿事。乾隆十四年(1749),沈德潜因喘疾久治不愈,请求告老还乡,乾隆皇帝批准以原品致仕,并要求沈德潜帮助他校改诗稿后离京。此时乾隆皇帝的诗稿一共有12本,沈德潜校改4本后进呈审阅,高宗和他对具体细节还有商榷,并为此事专门赠诗沈德潜表示谢意:“清时旧寒士,吴下老诗翁。……近稿经商榷,相知见始终。”^②至于其他文臣在誊抄时对诗歌是否进行了润色,则有待更多墨笔誊抄诗稿的清理出版才能准确判断。

第二,除朱笔手稿外,亦搜辑到少数墨笔写就、乾隆笔迹的诗稿。目前所见有5张,所书诗歌为:

《我皇考遐弃臣民遽易节序追思高厚再观无期予小子夙承庭训懋学书斋用是苦块之次述哀痛之忱中心迫切不能自己敬成长律以志终天之慕云》(2首)^③,

《恭送皇考梓宫至泰陵感成长句》(4首,见图7^④)、《咏禁中红叶赋得霜叶红于二月花》^⑤。这些作品皆为即位之初所作,此时他还没有使用朱笔撰述。由此或可推知,上述创作流程在高宗即位之初尚未形成,而是在御制诗日复一日的创作过程中、诗作数量日增一日的情况下逐渐完善的。

第三,以上所论皆为御制诗的创作,至于御制文的创作,亦有类似的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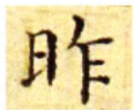


图6 《除夕》朱笔诗稿“昨”字修改痕迹

①原书书影更为清晰,见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49页。

②《御制诗二集》卷八《侍郎沈德潜以能诗受知因命编校御极以来诗集既竣事念其年将八帙许之归老吴中赋此以赐》,第320册,第280页。详参张杰:《朋友重然诺,况在君臣间:乾隆皇帝与“五词臣”的家人父子情》,《紫禁城》2019年第3期,第41页。

③图见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44-45页。此首作于雍正十三年(1735),收入《皇清文颖》卷首二二,未见于《乐善堂全集》或《御制诗初集》。

④出自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47页。《御制诗初集》卷一题作《丙辰十月十六日恭送皇考梓宫至泰陵奉安隆恩殿告祭还京悲慕如疑呼抢欲绝途次敬成长律以志深痛》,第319册,第91页。

⑤该诗收入《御制诗初集》卷一,图见故宫博物院:《几暇怡情——乾隆朝君臣书画特展》网上展览,网址:<https://ggzlquanjing.dpm.org.cn/scene/cWsA8IjmKzSZ3m9dAybtrvLXd4gjfL1E/jixiayiqing/tour.ht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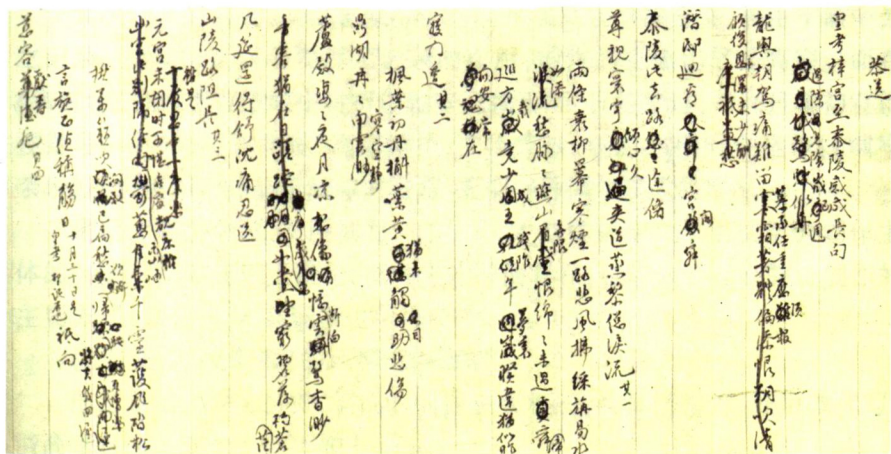


图7 《恭送皇考梓宮至泰陵感成长句》墨笔行书诗稿

程。例如,《四得续论》朱笔文稿及墨笔誊抄、朱笔修改稿2张(见图8^①),可以看出此文由清高宗用朱笔草拟,文臣两度誊抄、高宗也两次修改。2021年保利春拍展出的文稿也有同样的情况,篇目情况见附表。

四、对“代笔说”的回应

以上考察了御制诗创作的详细流程,不过仍有需要进一步探究的问题:前人所论三种文臣参与创作的方式,尤其是代笔之说,是否存在?

(一)文臣参与御制诗创作的主要方式应当并非代笔

上文梳理出的清高宗御制诗文的创作模式可以概括为“高宗草拟,文臣誊写、作注”。而前人所述的其他三种模式^②,又该如何理解呢?这里先聚焦探讨御制诗的情况,下一部分则会解释御制文。

首先,“高宗草拟,文臣誊写、作注”或者“润色”的模式,都会留下皇帝的亲笔手稿,因此这两种模式创作的诗歌数量可以由手稿数量推知。据故宫博物院的整理介绍,“乾隆帝一生共作诗43000余首,从现已整理的部分御稿看,大部分都可以在乾隆御稿中找到”^③。想要证实这一说法,最理想的方式,当然是把稿件与御制诗集的篇目进行逐一比较。不过目前条件尚不具备,只能加以推论。故宫博物院所藏稿件总数为55635张,姑且按5.4万张

①皆出自苏富比编:《香港苏富比2019秋拍图录·中国古代书画》,2019年,第45页;该文载《御制文三集》卷二。

②文臣还会在宴会等场合与清高宗联句作诗,参与到诗歌创作中,不过这并非本文探讨的重点,不再展开。

③故宫博物院编:《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核对成果展》,第42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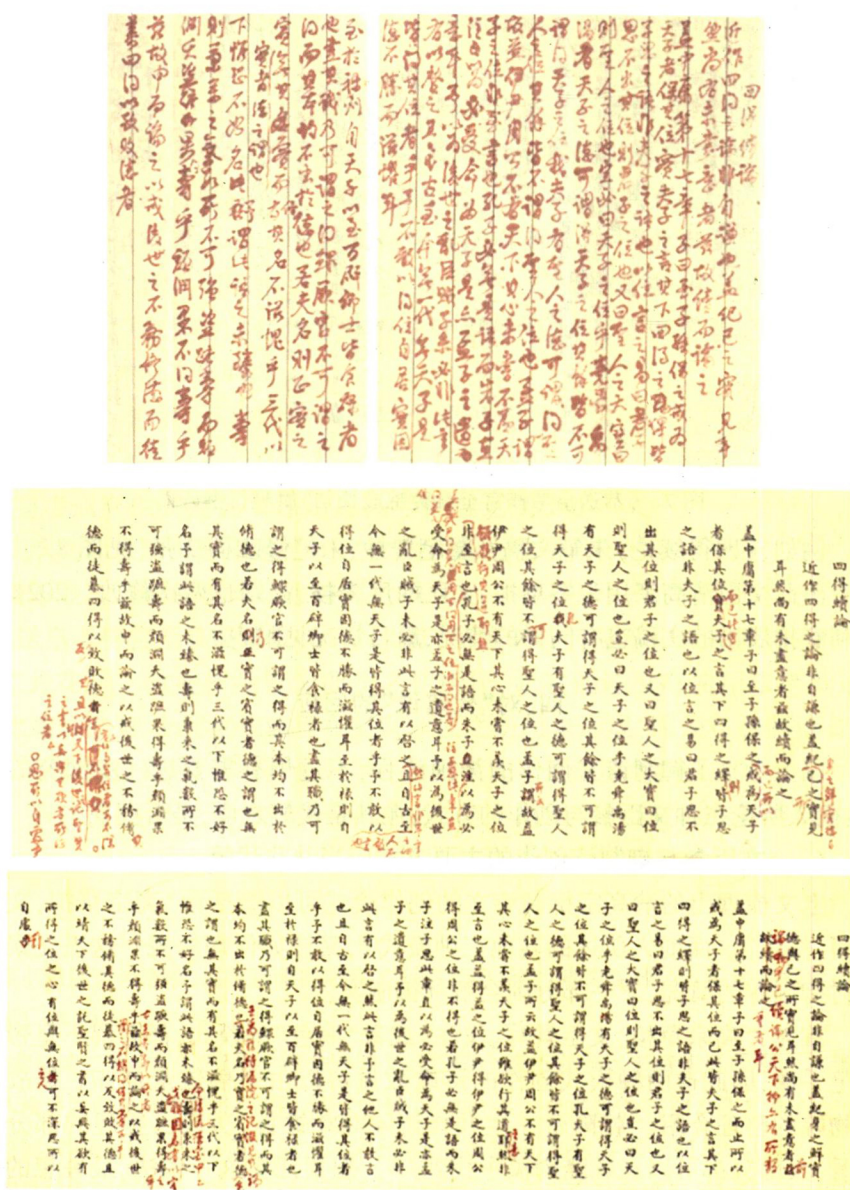


图8 《四得续论》朱笔文稿及墨笔誊抄朱笔修改文稿二张

来算,朱笔诗稿和“一一对应”的誊抄稿是主体,则朱笔诗稿数量约为2.7万。需要注意的是,一张诗稿并非只载一篇诗作,据已经展出、拍卖的朱笔诗稿统计,172张朱笔诗稿中包含266首诗,由此推算1张诗稿约载录1.5首诗,整体算下来超过了4万首,与传世诗歌总数相去不远。粗略推算可知,大部分诗歌是以“高宗草拟”为前提的,文臣的职责是誊抄、作注;是否有对正文进行润色,则有待更为充分的证据。

其次,“高宗口述,文臣记录”的方式,是清高宗口述全文,再由于敏中为之记录。这里文臣只是发挥了记录的作用,创作的主体仍然是高宗。而在《御制诗三集》卷首于敏中奏折中也有记载云“臣日侍禁近,每当丹稿初宣得预誊写……”^①,可知此时“高宗草拟,文臣誊抄”的方式同时在运作;《啸亭杂录》所载是用于凸显于敏中之聪慧,更似一种偶尔发生的情况。

最后,“高宗命题,文臣撰写”的方式,才是真正意义上以文臣为创作主体的“代笔”。基于以上推论,此种方式即便存在,也应该不是御制诗创作的主要方式;更进一步,其证据也值得商榷。

(二)支持“代笔说”的证据值得商榷

前已总结,学者支持代笔说的证据主要有三:沈德潜捉刀,汪由敦代写,清高宗自序。现逐一分析如下。

其一,沈德潜捉刀的史料不可据。在颜子楠《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一文中,考证了《清代外史》记载之不可信,并进一步溯源,指出“根本就是小说家的演义”^②,此不赘言。关于沈德潜,除了此条野史记载,还有朱赛虹提出的证据“据史书记载,清代初中期的著名诗论家和诗人沈德潜就是秉笔大臣之一,他于乾隆四年成进士时已67岁,此后即以诗受知于乾隆皇帝”^③。当指沈德潜为乾隆帝校阅御制诗初集诗本四册之事,亦不属代笔。

其二,赵翼所言汪由敦代写之作,是指御制文。该条史料出自赵翼《檐曝杂记》,当属可靠。不过其中明确说明,“寻常碑记之类”的御制文“亦有命汪文端具草者”。是否由此能推知御制诗也是代为撰写的呢?这就涉及到最重要的一条证据——清高宗自序。

其三,清高宗自序所谈代笔之事,应将御制诗与御制文分别看待。各学者所依据的核心证据为高宗自序“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贋各半”。回到原文来解读此句,《乐善堂全集》卷首御制序曰:

往者岁庚戌(雍正八年1730),曾录数年中所作序、论、书、记、杂文、诗、赋,次为十有四卷,置诸几案。时就所言以自检其行,嗣是所作,盖四倍前。继序以来,躬理万几,兢兢业业,惟恐一事失宜,负皇考付属之重。思如曩时从容文墨之娱,不可复得。然少有余闲,未尝不考镜经史以自观省。爰取《庚戌文钞》所载,存十之三;续作未订入者,存十之七,总为一编,共若干卷。非欲以文辞自表著,盖是集乃朕夙昔稽古典学所心得,实不忍弃置。自今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贋各半。且朕

①《御制诗三集》卷首于敏中奏折,第322册,第1页。

②颜子楠:《沈德潜生平三事献疑》,《励耘学刊》2017年第2期,第49-51页。

③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说略》,第46页。

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以转贻后世之讥,则是集之辑有不得已者。^①

此段是在回顾编纂《乐善堂全集》的过程。雍正八年“曾录数年中所作序、论、书、记、杂文、诗、赋,次为十有四卷”;自此至登基前“时就所言以自检其行,嗣是所作,盖四倍前”;登基以后,“虽有所著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贋各半”。可知,此句话是清高宗针对各类诗文笼统而言的。因此,需要将诗、文分别考察,以明确高宗之意。

先看御制诗,《御制诗初集》卷首乾隆十四年(1749)《初集诗小序》云:

向叙《乐善堂集》云:“夙昔典学所心得不忍弃置,后虽有作,或出词臣之手,真贋各半。且亦不欲与文人学士争长。”故十数年来,臣工以编次诗文集为请者,概弗许。

然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文、赋不数十篇,诗则托兴寄情、朝吟夕讽,其间天时农事之宜,莅朝将祀之典,以及时巡所至山川名胜、风土淳漓,罔不形诸咏歌,纪其梗概,积至今以数千百首计矣,而较晴量雨、悯农疾苦之作为多。观其诗可以知忧劳而验今昔。

使阅岁逾时,或致残缺失次,其不忍弃置,较先为甚。因取丙辰以迄丁卯所作,略加编定,都为四十四卷,古今体计四千一百五十首有奇。

命翰林中字画端楷者分卷抄录,装为一集,不付剞劂,犹初志也。^②

这里首先引《乐善堂全集》的序,以之为拒绝“编次诗文集”的理由。接着转折,“几务之暇,无他可娱,往往作为诗、古文、赋”,其中“文赋不数十篇”,作诗则“以数千百首计矣”。这段明确说到的数十篇文赋、数千百首诗乃政务之余所作,并未说是词臣代笔;所言诗歌数量与《御制诗初集》的4100余首也是基本契合的;并且与赵翼所说“日加已,皆燕闲时矣。或作书,或作画,而诗尤为常课,日必数首”^③吻合。

再来看御制文,乾隆二十八年(1763)成书的《御制文初集·凡例》云:

恭绎《御制乐善堂全集·序文》有云:“自今以后虽有所著述,或出词臣之手,真贋各半。”此盖谦尊之德,因时立言。臣忝列禁近,伏见我皇上典学几馀,研朱濡翰,刻晷成文数百千言,不加点乙,皆在廷诸臣管蠡所不能窥,涓壤所莫能赞。若前序所云,或指寻常碑文序记,循例撰拟者而言。兹集编载,并亲御丹素所成,向登文本者,其臣下代言诸作,概未敢附列,以纪征实。^④

①《乐善堂全集》卷首御制序,第331册,第46-47页。

②《御制诗初集》卷首《初集诗小序》,第319册,第1页。

③赵翼撰,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二》,第7页。

④《御制文初集》卷首《凡例》,第330册,第4页。

此段虽多奉承之言,然而也提供了重要信息。这里对《乐善堂全集》序言所说“出词臣之手”的解读是“若前序所云,或指寻常碑文序记,循例撰拟者而言”,赵翼记载汪由敦代写御制文亦当指此类。

这些代作的文章未收入御制文集,如据《日下旧闻考》记载,北京大报国慈仁寺“乾隆十九年(1754)发帑重修……窑变观音像今奉于正殿之后,北向。龕座周镌《御制窑变观音像记》”^①,此篇不见于御制文集。记曰:

报国寺中瓷观音一座,宝冠绿帔,妙相庄严,相传得之窑变,不假人工。详孙国敕《燕都游览志》。夫埏泥屑石,止于因物付形。自非大具神通,何由宝饰珠装,顷刻幻成相好?是知灵呈埴埴,体肖本来,千万亿菩萨化身随处涌现,有不可思议功德。瞻礼之余,并识灵迹,俾人天观者知佛海栴檀原自转轮无碍耳。^②

通过将御制诗与御制文分别考察,可见:对于御制诗,清高宗从未明确言及代笔之事;而御制文中的“寻常碑文序记”由文臣代为撰写的情况应不在少数,这也与历代帝王撰写序跋碑文等的情形相符。

(三)清高宗的高频创作具有一定可行性

在三种证据之外,朱赛虹根据常理推断、质疑清高宗创作的频率过高,也代表了诸多读者的想法。以下结合创作流程对这一“高频创作”行为的可行性加以论述。

就御制文而言,寻常碑记的创作可能由文臣代笔,收入文集的作品总数虽多达1900余篇,不过考虑到清高宗从雍正八年(1730)起近七十年的创作生涯,则他写文章的频率并不超常。至于朱赛虹谈到乾隆帝在一天创作六篇序文一事^③,经统计,六篇文章合计约3000字,皆为各朝《实录》与《圣训》所作序言,内容相似。哪怕不考虑文章经过数日积累而成,或者是有文臣代笔的情况,也并非不可能实现的任务。赵翼记述清高宗“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学碑文,属草不过五刻,成数千言”^④,也可看作一种印证。

更引人关注的是乾隆帝高频作诗的可行性。一方面,文臣辅助下“流水线”般的创作流程,提升了作诗效率:高宗只需朱笔作草,后续交给文臣誊抄、注释;哪怕遇到一些需要“引经据典”的作品,文臣也可发挥资料检索的功用,这就加速了其创作的过程。另一方面,从清高宗自己对诗歌的定位来

①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外城西城一》,北京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964页。

②于敏中等:《日下旧闻考》卷五九《外城西城一》,第965页。

③详参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概析》,第89页。

④赵翼撰,李解民点校:《檐曝杂记》卷一《圣学一》,第7页。

看,他并不看重其文学价值,“非欲以文辞自表著”“不欲与文人学士争巧”^①;反而注重诗歌的纪实价值,将其作为政务的记录,内容“皆关政教,大而考镜得失,小而廛念民依,无不归于纪实”^②,他期待这些纪实性的诗歌,像史书一样,“观其诗可以知忧劳而验今昔”^③。“拈吟终日不涉景,七字聊当注起居”^④,可以说是这种创作观念的写照。诚如朱赛虹所言“最出色的作家也不可能天天出作品”^⑤,但乾隆帝并未将诗歌定位为“文学作品”,如此就省下了关注诗歌文学价值的时间与精力,进一步提升了作诗效率。

基于前述创作流程与作诗理念,乾隆写诗的速度非常惊人。例如,乾隆三十六年(1771),他乘船去昆明湖,不到一小时就写了8首诗,“舟行十里诗八首,却未曾消四刻时”^⑥。又如,乾隆五十年(1785),他去香山游览,“自十一日驻蹕香山,五日得诗凡六十七首”^⑦。

五、结论

本文利用新见乾隆御稿,结合清高宗诗文集的序跋与乾隆朝文臣的奏折、笔记等,对清高宗御制诗文的创作状况进行了考察,得出如下结论:第一,就创作主体而言,御制诗与文不同。基于目前所见证据进行推论,御制诗中大部分应当是清高宗自己创作的,文臣负责誊抄、作注、核查信息、增补诗序、编排题目等;至于是否存在文臣为创作主体的代笔情况,则尚需更为可靠的证据。御制文中,碑文、序、记等存在文臣代为撰写的情况。第二,御制诗文的具体创作流程包括:清高宗朱笔作草,文臣墨笔折纸楷书誊抄、依令作注,清高宗用朱笔批改,内监或文臣将诗片抄入诗本,积十二年之诗本编刻成御制诗集、交由武英殿刊刻等步骤。

基于上述成果,学界得以更好地利用清高宗诗文:乾隆御稿所呈现的增删改易,有助于明确高宗思想形成的细致过程;对御制诗创作主体的进一步厘清,则增加了御制诗作为体现皇帝思想、情感之史料的可靠性。同时,清

①《乐善堂全集》卷首御制序,第331册,第47页。

②《清高宗纯皇帝实录》卷一三〇一,乾隆五十三年(1788)三月十九日辛巳条,第25册,第495页。

③《御制诗初集》卷首《初集诗小序》,第319册,第1页。

④《御制诗五集》卷六四《东甘涧(其二)》,第328册,第549-550页。

⑤朱赛虹:《清代御制诗文概析》,第89页。

⑥《御制诗三集》卷九九《过广源闸换舟遂入昆明湖沿缘即景杂咏(其八)》,第324册,第282页。

⑦《御制诗五集》卷十五《香山旋蹕于玉泉山静明园传膳视事作》诗注,第327册,第460页。

高宗御制诗文的创作、编刊本身,具有浓厚政治意味,成为书籍史、阅读史中值得关注的案例,也值得在本文基础上进一步拓展;例如,御制诗文创作的复杂过程,包含了文臣与高宗的互动,其背后的权力关系很值得玩味。

需要指出的是,本文所据核心资料“乾隆御稿”仍在整理之中,目前公开的内容十分有限,故本文对代笔说的论断和创作流程的考察尚属初步;随着更多手稿的发布,相关问题的探索也会逐步深入。

附录:展览、论文、拍卖所见乾隆御稿信息表^①

展览、论文、拍卖信息	稿件类型数量	诗文篇目
2016 年成都博物馆 “盛世天子:清高宗 乾隆皇帝特展” ^②	朱笔诗稿 6 张, 诗 7 首	《命加赈去岁偏灾各省贫民即事八韵》《咏古竹根笔筒》,《重华宫茶宴廷臣及内廷翰林等题程荣耕织图联句复成二首》(2 首)(诗四集卷一);《新春万寿山二首》(2 首)(诗四集卷二);《读论语》(诗四集卷六九)
2017 年故宫博物院 “大隐于朝:故宫博物院藏品三年清理 核对成果展”	朱笔诗稿 9 张, 诗 14 首 墨笔行书诗稿 4 张,诗 6 首 墨笔誊抄诗稿 1 张,诗 1 首	《我皇考遐弃臣民遽易节序追思高厚再观无期予小子夙承庭训懋学书斋用是苦块之次述哀痛之忱中心迫切不能自己敬成长律以志终天之慕云》(2 首)(《皇清文颖》卷首二二)【墨笔行书诗稿】; 《恭送皇考梓宫至泰陵感成长句》(4 首)(初集卷一)【墨笔行书诗稿】; 《悼敏皇子将送往朱华山一临酌酒七字吟悲》(诗二集卷四);《梦·六月十五日》(诗二集卷五);《畅春园集凤轩恭候皇太后问安之作》(诗二集卷十七);《暮春圆明园》(诗二集卷十七);《驻蹕良乡行宫作》《月》(诗二集卷六六);《赐江西巡抚胡宝瑑》(诗二集卷六七);《夜雨二首》(2 首)(诗二集卷六八);《赐安徽巡抚高晋》(诗二集卷七一);《赵孟頫墨兰》《黄公望山水》(诗三集卷十);《除夕》(诗五集卷一百)【有墨笔誊抄诗稿】; 《丙辰元旦》(诗馀集卷一)

①前文已注图片出处者,不复出注;后出展览与此前篇目重复者不再记入;诗歌篇目一栏,括注集名、卷次信息,如“诗四集卷一”即为《御制诗四集》卷一。

②成都博物馆、故宫博物院编:《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四川人民出版社,2016 年,第 59-63 页。

续表

展览、论文、拍卖信息	稿件类型数量	诗文篇目
2017 年浙江省博物馆“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 ^①	朱笔诗稿 7 张, 诗 20 首	《阅海塘四叠旧作韵》《阅杭州旗兵》(诗五集卷五);《五题西湖行宫八景》(8 首)、《题西湖十景五叠旧作韵》(10 首)(诗五集卷六)
2019 年故宫博物院“贺岁迎祥——紫禁城里过大年” ^②	朱笔诗稿 14 张,诗 24 首	《生春二十首用元微之韵》(20 首)(诗三集卷六九);《甲子元旦》(诗初集卷二十);《庚午元旦》(诗二集卷十四);《庚辰元旦》(诗三集卷一);《乙卯元旦》(诗五集卷九三)
2019 年故宫博物院“几暇怡情——乾隆朝君臣书画特展”	朱笔诗稿 2 张, 诗 4 首 墨笔行书诗稿 1 张,诗 1 首	《咏禁中红叶赋得霜叶红于二月花》(诗初集卷一)【墨笔行书诗稿】; 《赵昌写生蛱蝶》(诗初集卷二);《夏珪秋江风雨图》《题何浩万壑松涛卷》(诗初集卷三);《题宋宣和澄泥砚》(诗二集卷二二)
华宁《即景合璧咏双绝:谈乾隆御题林逋书迹二种》	朱笔诗稿 6 张, 诗 6 首 墨笔誊抄诗稿 1 张,诗 1 首	《题林逋诗帖真迹用卷中苏轼书和靖林处士诗后韵》(诗二集卷七十);《题林逋苏轼诗帖叠旧作韵》(诗三集卷二一);《题林逋苏轼诗帖再叠旧作韵》(诗三集卷四八);《题林逋二扎四用苏轼韵》(诗三集卷七八);《再题林逋诗帖卷四迭前韵》(诗四集卷七一);《题林逋诗帖卷五叠前韵》(诗五集卷六)【有墨笔誊抄诗稿】

①浙江省博物馆编:《盛世天子:清高宗乾隆皇帝特展》,第 70、116-117、230-231、252-253 页。

②此次展览未见出版物,网络展览中书稿亦缺失,依据展览介绍、探展记录中的图片推知篇目等讯息。

续表

展览、论文、拍卖信息	稿件类型数量	诗文篇目
2016 年 6 月北京匡时清代宫廷书画	朱笔诗稿 63 张,诗 97 首 ^①	编入《御制诗四集》卷三三、卷三四
2017 年 12 月嘉德秋拍“四海崇誉庆典之夜·古代”	朱笔诗稿 49 张,诗 74 首	
2021 年 4 月保利春拍“弘历的世界·乾隆御制诗文稿” ^②	朱笔诗稿 16 张 诗 20 首	
	墨笔誊抄诗稿 13 张,诗 13 首	编入《御制诗五集》卷四二
	朱笔文稿 16 张,对应墨笔誊抄文稿 19 张,载文 16 篇	《陈居中画释加佛赞》《罗汉赞次右》《罗汉赞次左》(文二集卷四二);《栽者培之倾者覆之》《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文三集卷一);《八徵耄念之宝记》(文三集卷八);《五代胡瑰番马图识语》《书宋孝宗赐曾觐书册后》(文三集卷十);《书晏婴叔向论齐晋事》(文三集卷十三);《宋砚铭六首》(6 篇)、《旧青绿澄泥石渠砚铭》(文三集卷十五)
2019 年 10 月香港苏富比秋拍	墨笔誊抄诗稿 1 张,诗 1 首	《回蹕至御园之作》(诗五集卷四二)
	朱笔文稿 1 张,对应墨笔誊抄文稿 2 张,文 1 篇	《四得续论》(文三集卷二)

【作者简介】高策,清华大学人文学院讲师、清华大学写作与沟通教学中心专职教师。研究方向:中国古典文献学。

①北京匡时编:《乾隆御制朱笔诗稿》统计稿件载诗歌 96 首,实核 97 首。

②保利艺术博物馆、保利艺术研究院编:《弘历的世界》上卷《丹稿初成——乾隆御制诗文稿》,上海书画出版社,2021 年。